

冷戰電影與「真理運動」： 新馬的個案

• 許維賢

摘要：1950年美國杜魯門(Harry S. Truman)政府在全球全面發動反共的「真理運動」，策劃針對蘇聯、中國以及東南亞國家等等的一系列心理戰計劃和項目。美國國務院屬下的新聞總署秘密特約和贊助紐約聲馬達影片公司(Sound Masters, Inc. of New York)前赴新加坡和馬來亞製作和拍攝數部冷戰電影，其中包括出自好萊塢導演伊遜(B. Reeves Eason)的作品。這些冷戰電影大量聘請新馬本地的華人演員和馬來演員在片中飾演各角，由邵氏兄弟有限公司負責電影的發行和放映。電影市場主要針對東南亞華人和馬來人群體，尤其是那些不太識字的大眾群體。1953年在新馬各地戲院上映的馬來語片《小村烽火》和粵語片《星嘉坡故事》正是冷戰年代「真理運動」的典型產物。本研究從「真理運動」的冷戰語境探討伊遜在新馬製作的反共電影，並結合美國和新加坡國家檔案館的解密檔案，以及冷戰時期英美和新馬報刊的第一手資料，探討這些冷戰電影如何以粵語和馬來語散播「真理運動」的意識形態。

關鍵詞：冷戰 「真理運動」 《小村烽火》 《星嘉坡故事》 杜魯門(Harry S. Truman)

一 冷戰語境下的「真理運動」

我們的任務是要向那些無知的、被誤導的和還沒被說服的數以百萬人類傳達真理。我們的任務就是要在他們工作和學習中抵達他們的日常生

* 本文是筆者有關早期新馬電影研究計劃的一部分(編號：RGT26/13)，得到新加坡南洋理工大學一級研究經費的資助，謹致謝忱。在收集資料過程中，非常感激美國國家檔案館職員的支持以及杜漢彬的鼎力協助，亦感謝舛谷銳教授和莊華興教授邀請筆者在2016年赴日本立教大學「國共內戰與冷戰時期的馬華文學、語言與社會」國際研討會宣讀拙文初稿，特別感謝村井寬志教授現場的講評。最後感謝《二十一世紀》兩位匿名評審給予寶貴的修改意見。

活。我們一定要盡可能不分人們的教育背景和文化背景，以機敏、巧妙和細心的方式抵達不同國家的人民群體。我們的任務是要向他們證明自由才是社會經濟進步之道，亦是謀求政治獨立之道，也是強盛、幸福與和平之道^①。

上述是美國杜魯門 (Harry S. Truman) 總統於 1950 年 4 月致美國新聞編輯協會的演講摘要，他呼籲全美無論是公共界或私人界必須全力配合美國政府，動員所有資訊渠道如報紙、雜誌、收音機和影片等等，在國內外大力宣揚美國有關民主和自由的真理，向全球的共產帝國主義宣戰，揭露共產宣傳機器的「紅色謊言」，這乃「真理運動」(The Campaign of Truth) 的宗旨。

杜魯門是掀開全球「真理運動」序幕的關鍵人物。1949 年 7 月 1 日，在一份由美國國務卿提呈給美國國家安全委員會有關美國對東南亞政策的機密報告中，提及當時東南亞的八百萬華人被美方視為威脅整個區域的少數族群：「這個問題在馬來亞和泰國極度嚴重，這些華人墾殖民拒絕同化，他們跟中國緊密聯繫，他們提供隔離〔於主流〕的〔華文〕教育予孩子，投入中國政治，以及把大量財富匯給祖國。」報告也指控中國共產黨不尋常地扮演着重要角色，提供外援指導和支援予東南亞的共產運動，眼看國共內戰中中共逐漸佔了上風，這些東南亞的共產份子很可能會日益壯大，預計區域的大部分地區將會露出被華人叛亂加倍威脅的凶兆。這份報告接着如此申明：「華人在馬來亞的主導勢力被視為唯一足以取代英方政府的統治，這對馬來亞和英方來說是難以接受的。」^②

隨着 1949 年 8 月蘇聯共產黨成功試驗第一枚原子彈，同年 10 月中共在中國取得政權，以及 1950 年 6 月朝鮮戰爭爆發，1950 年代全球文化冷戰急速升溫：一邊是蘇聯政府在全球動用了諸多宣傳機器發動對美國進行「和平攻勢」(Peace Offensive) 的「仇恨美國」(Hate America) 運動^③；另一邊則是美國杜魯門政府在全球全面發動反共的「真理運動」，同時創建心理戰略委員會 (Psychological Strategy Board)，策劃針對蘇聯與中國、西歐、中東、東南亞國家的一系列心理戰計劃和項目^④。當 1950 年 9 月杜魯門簽署了「真理運動」的法案以後，美國各種對外宣傳的項目經費得到前所未有的大幅度提高，主要用於製作更具宣傳效果的電影、改善印刷和出版機制、建設規模更大的圖書館，以及創立規模龐大和多樣化的資訊媒體，作為配合特殊視聽群體的需求^⑤。這其中包括對外人員交流項目撥款從 1950 年的 260 萬美元增至 1951 年的 620 萬美元；電影製作的撥款從本來的 250 萬美元增至 1,180 萬美元；廣播的撥款從 890 萬美元增至 1,610 萬美元；文化活動的撥款從 220 萬美元增至 370 萬美元；新聞出版的撥款從 270 萬美元增至 680 萬美元^⑥。顯而易見，這當中以電影製作的撥款幅度增加最大，增幅超過四倍。

1951 年，美國國務院倡議為那些無法製作政治宣傳劇情片並發行到海外的好萊塢片廠提供財力支援並承擔經濟責任^⑦。冷戰年代，國務院屬下的美國新聞總署 (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Agency, USIA) 指揮海外的新聞處 (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Service, USIS) 在全球贊助或製作大量的反共電影，其中包

括法國和意大利，東南亞更是他們的支援重點；一共有三十一個國家被美方視為需要得到特別關注，這些國家要不是屈服於共產主義的主導，就是正在嚴重被共產黨勢力影響^⑧。美方專家認為僅僅依賴向世界各地不斷廣播的「美國之音」(Voice of America)已無法完全實現「真理運動」的任務，並引述「一圖勝千言」的中文格言，指出目不識丁的大眾群體對影像的興趣遠遠大於聲音和文字，因此美國國務院決定主動向好來塢公司提供協助，以合約的方式資助這些公司製作反共影片^⑨。

直至1954年，三分之二的這些反共電影都是動用各國的當地人才和設施來製作。單是1956年的上半年，USIS在全球就協助六十五部紀錄片和劇情片的後期製作^⑩。同年，艾森豪威爾(Dwight D. Eisenhower)政府在白宮召開大規模的「人對人會議」(People-to-people program，指當年美國政府動員各個領域中的民間力量，與非營利團體及個人的合作關係)，基於培養民主主義、驅逐共產主義的信念，意圖與國內外各行各業的人物進行交流，隨後就設立了不少有關電影人和演藝人員的委員會。從一份日期標明1956年8月16日的USIA檔案〈電影委員會名冊〉看來，華納電影公司(Warner Bros. Entertainment Inc.)老闆、二十世紀福斯電影公司(20th Century Fox Film Corporation)老闆和派拉蒙電影公司(Paramount Pictures Corporation)社長等的名字皆出現在名冊裏，顯示好萊塢業界的龍頭多半已經參與其中^⑪。日本學者谷川建司指出，1950年代好萊塢電影產業在步調上配合着美國政府所希望的方向，以一種政商相互依存的方式製作了許多影片，而向全世界傳達了「強大的美國軍隊維護着世界和平及秩序」的印象^⑫。

1952年5月，美國國務院內部發出機密文件〈美國新聞處對東南亞華僑的宣傳戰略〉(下稱〈宣傳戰略〉)指出，針對東南亞華僑的其中兩個宣傳戰略重點分別是：其一，全面啟動「反共」宣傳，揭露中共在大陸實施殘酷的社會監控、鎮壓以及動輒進行死刑的暴行，正面宣揚美國和「自由世界」的民主價值觀；其二，揭示中共政權無力也無意支援和保護海外華僑，東南亞華僑的個人利益跟共產黨勢力在東南亞的擴張是勢不兩立的^⑬。這份宣傳計劃的出台標誌着東南亞華僑成為美國對外宣傳戰略的頭等重要宣傳對象，也是美國首次、亦是唯一一次不是以國家而是以族裔為對象制訂的宣傳計劃^⑭。

根據新加坡國家檔案館收藏的一份1952年8月的解密信函內容，紐約聲馬達影片公司(Sound Masters, Inc. of New York，下稱聲馬達公司)自1951年5月起就已經在新加坡拍攝數部反共影片，並在新馬停留了十五個月，而幕後秘密主導其事的是美國國務院。信函裏還提到該公司拍戲留下來的攝影器材，有些已寄回美國，有些還留在新加坡，而其他攝影器材則出租給英殖民政府屬下的馬來亞製片組(Malayan Film Unit)^⑮。

1953年在新馬由邵氏兄弟有限公司(下稱邵氏)經營的戲院先後公映的馬來語片《小村烽火》(Kampong Sentosa)和粵語片《星嘉坡故事》(Singapore Story)，其製作和拍攝經費就是由USIA全額贊助，聘請好萊塢導演伊遜(B. Reeves Eason)^⑯到新加坡拍片，大量聘請新馬本地的華人演員和馬來演員在片中飾演各角，片子由聲馬達公司製作。伊遜擅長拍攝動作片和西部片，一生總共

導演150部電影左右，代表作有西部片《原野的法則》(*The Law of the Wild*, 1934)和《神奇的騎手》(*The Miracle Rider*, 1935)等。他早期就已在華納電影公司旗下導演過數部與美國武裝部隊合作拍攝的「親美」短片，包括榮獲奧斯卡金像獎的《給我自由》(*Give Me Liberty*, 1936)、《天空的男人》(*Men of the Sky*, 1942)、《工程師的戰鬥》(*Fighting Engineers*, 1943)、《高山上的戰士》(*Mountain Fighters*, 1943)等等¹⁷。

《小村烽火》和《星嘉坡故事》分別以1950年代初的馬來亞和新加坡社會為背景，前者聚焦馬來人村落，後者鎖定華人社區。兩部電影都以馬共份子如何滲透馬來亞和新加坡社會作為敘事主題，這些出自好萊塢導演的新馬故事是冷戰年代「真理運動」的典型產物。本文除了分析這兩部片子的運鏡和演出，也結合美國和新加坡國家檔案館的解密檔案，以及冷戰時期英美和新馬報刊的第一手資料，探討這兩部電影如何以馬來語和粵語散播「真理運動」的意識形態，以及兩部片子是否也像當時其他好萊塢反共電影那樣，向全世界傳達了「強大的美國軍隊維護着世界和平及秩序」的印象？這兩部片子到底在多大程度上能代表當年「真理運動」的反共意識形態在新馬的傳播模式？這也是筆者選擇討論這兩部片子的原因。

上述這些被保存下來的USIA電影產品有助於提供豐富的研究材料予各類學門，可是這些由USIS在海外出資或製作的冷戰電影長期在美國學界不被關注，主要原因之一是1948年美國政府通過《信息與教育交流法案》——俗稱「史密斯—蒙特法案」(“Smith-Mundt Act”)，禁止USIS的任何產品包括影片在美國境內公映，一直到1990年上述法案成功被修訂後，有關規管才得以解除。但由於有關檔案和影片不易獲取，關於這些電影的記載至今還是在美國電影史和電視史研究中缺席¹⁸，更不要說是被新馬電影史選擇性地遺忘；至今尚未有學術文章全面探討聲馬達公司在新馬製作的冷戰電影，有鑒於此，本文有意彌補這片空白。

二 《小村烽火》：馬來亞人民與馬共份子

早在1950年，新加坡的USIS主任羅倫斯(W. Henry Lawrence, Jr.)就在新馬《海峽時報》(*The Straits Times*)發表文章，論及美國在新加坡和吉隆坡設立USIS的宗旨與對外服務，文章當然沒有出現任何「反共」字眼，僅強調USIS的宗旨是要推動國與國之間的知識交流和提供公共服務，其中一項公共服務就是已在當地設立美國電影圖書館，館藏美國紀錄片、電影、劇本、音樂等等材料，供公眾機構借閱，讓公眾認識美國人的生活方式和成就¹⁹。當時新加坡USIS的任務也包括暗中支援在「真理運動」下於新加坡進行的《小村烽火》影片製作，該片是直接由美國國務院秘密指揮聲馬達公司前赴新加坡進行拍攝，講述「可憐的馬來人遭受到邪惡的共產游擊份子弱肉強食」²⁰。

《小村烽火》的新馬代理商是邵氏，1953年5月，邵氏在新馬各地的麗士(REX)戲院放映這部電影。當年《南洋商報》如此報導這部電影：「故事針對馬來

亞之動亂，全部角色由馬來亞人民主演，係一種時事巫語片云。」^②《小村烽火》是在新加坡電影審查組的隨同下到新加坡的榜鵝 (Punggol) 取景拍攝，並完全由非職業演員在劇中合作演出^③。故事場景設置在一座馬來人居住的寧靜甘榜 (Kampong Sentosa)，以及另外一座華人居住的夏氏漁村 (Kampong Siak)。片頭以馬來文標明「這個故事在馬來亞拍攝，而且由馬來亞人民主演」，電影開頭一如馬來亞製片組拍攝的反共電影，先是俯拍森林的大遠景，引導觀眾想像森林中藏有恐怖份子 (penganas)，整段馬來語的畫外音敘述如下：

馬來亞森林隱隱約約滿布着讓馬來亞人民感到害怕的陰影。這裏土地肥沃，人民朝氣蓬勃、剛毅和強壯，米飯是他們的主要糧食。樹膠液的生產促進了社會財富和繁榮，豐富的錫礦資源提供了全世界市場的需求。可是，就是在這些森林裏藏着這些進行騷擾、搗亂和拐帶活動的恐怖份子，讓原本快樂生活的寧靜甘榜的人民提心吊膽。在這片寬闊的森林中，藏匿着兇狠的恐怖份子，他們對性格正直的人們進行威脅、殘殺和施暴。

由此可見，此片劈頭就把馬來亞人民和馬共份子進行正邪對立。

影片時代背景設定在英殖民政府頒布緊急狀態 (Malayan Emergency, 1948) 後，華人巡官奔走在寧靜甘榜和夏氏漁村之間，力勸兩地村長盡早合作組織鄉民成立人民自衛隊，以保護鄉民和財物不受馬共份子威脅。寧靜甘榜的村長、巫師、宗教師和老師起初都有些猶豫，他們認為寧靜甘榜很小，也很安寧，馬共份子不可能看上這座貧窮的甘榜；而夏氏漁村比較富庶，其華人村長比較支持成立人民自衛隊，此情節設置貫徹了上述美國國務院〈宣傳戰略〉中要求媒體展現「東南亞華僑的個人利益跟共產黨勢力在東南亞的擴張是勢不兩立的」的對峙局面。

故事的兩位男主角馬來人阿曼 (Mat) 和華人阿通 (Ah Tong) 是建築工作的合作夥伴，分別住在寧靜甘榜和夏氏漁村。阿通是夏氏漁村村長的兒子，非常勤奮工作，協助阿曼造房子。阿曼和寧靜甘榜村長女兒是對情侶，他一直儲錢希望能迎娶村長女兒，但辛苦儲錢買下的戒指卻被馬共派來村子的一名華人偵探何平 (Ho Peng) 偷走了，激起了他對馬共份子的怒火。同一時期，巫師的家也被一位穿着軍裝的馬共女游擊隊員紅梅 (Hong Mui) 率領的馬共份子光顧，他們搶走了巫師的藥物、金錢和米糧，並威脅巫師不准報警，不然會殺人滅口。在發生一系列事件後，寧靜甘榜村長終於支持成立人民自衛隊。

此事過後，某日紅梅穿着便裝佯裝村民，有意偷渡進夏氏漁村視察村民的情況，阿通剛好要划船回家，她向阿通謊稱自己要去夏氏漁村探訪親戚，阿通順便載她一程，兩人開始了交往。阿通稱讚紅梅長得漂亮，紅梅對英俊的阿通也產生了莫名的好感。另一方面，何平把偷來的戒指送給紅梅，強抓她的手臂向她示愛，紅梅摑了他一巴掌，兩人的友誼宣告破裂。不久，寧靜甘榜和夏氏漁村的兩位村長先後都被何平和馬共份子綁架和關押在森林裏。領導這支馬共團隊的領導名叫老毛 (Lau Mah)，何平和紅梅都要向他報到。紅

梅不滿何平隨意恣意游擊隊員拳打腳踢手無寸鐵的村長，何平反而嘲笑紅梅心腸軟，暗示她容易向敵人投降。其後，何平向老毛密告紅梅有意背叛馬共，紅梅更當場被何平審問和痛打，然後被捆綁了起來，等候死刑。最後，紅梅排除萬難從森林逃了出來，投向英方陣營。

這時華人巡官已成功秘密訓練了人民自衛隊，委任阿通作為夏氏漁村的自衛隊隊長，阿曼被委任為寧靜甘榜自衛隊隊長。在紅梅的帶領下，英軍部隊結合自衛隊的力量進入森林，在幾番激烈的駁火中，成功捕抓馬共份子，並擊潰了老毛，拯救了寧靜甘榜和夏氏漁村的村長。紅梅立下大功，獲華人巡官的大力表揚，並突兀地首次公開紅梅的真正身份——原來她一直都是英方暗中指揮的特務，潛伏在馬共部隊，向英方提供情報。另外，阿通和阿曼作為隊長的表現也受到英方的表揚。最後，阿曼如願以償與寧靜甘榜村長女兒結婚，阿通則與紅梅共結連理，雙方的婚禮都得到寧靜甘榜和夏氏漁村村民的熱烈出席和祝福。

此片說教味道很重，除了紅梅的演技比較自然得體，其他演員大部分都明顯看似在背台詞，動作生硬，就像導演的活動道具。這也許是由於此片僱用的演員都是非職業演員，導演也不諳馬來語、華語或其他本地方言，無法有效指導演員入戲和站位，更無法掌握本地人的語感。片中華人與華人的對話都用馬來語，馬共華裔黨員之間也是以馬來語溝通，甚至華人家庭成員之間也用馬來語溝通，使當地看似一個華人都被同化成馬來人的國度。而大部分的華人角色所操的馬來語也不流利，看似在死背對白的情況下入戲；用的是「巴利」馬來語，在語法和用詞上其實也跟片中馬來人操的馬來語沒有多大不同，僅有發音和流利程度的差別。片中僅有一個中景鏡頭，即阿通回到夏氏漁村遇到鄉民，鄉民以粵語「早晨」（早安）問好，其他對白都用馬來語。馬來演員在片中的演技同樣生硬無比，目光無神，很容易讓人以為這些演員都是在被指使的情況下接戲。另外，片中馬共隊伍裏有一位比較難以在其他反共電影中出現的馬來裔馬共份子^③，但其戲份不重，僅是一名被老毛呼來喚去的手下。老毛的取名明顯是影射「毛澤東」，這位操馬來語的老毛在片中顯得殘暴和貪婪，他與馬共成員之間的對談沒有展現任何有關共產主義的措辭，更似一幫土匪在森林中紮營，定時出來掠民財物，這符合英美帝國意識形態對共產黨員的刻板化印象。

片末出現森林槍戰的場面，鏡頭與鏡頭之間剪接 (cut) 相當緊湊，現場槍聲此起彼落，頗能凸顯真實的戰爭狀態，顯然是擅長拍攝動作片的導演伊遜比較得心應手的部分。此外，也許是伊遜一直以來在好萊塢導演展示大自然景物的西部片，因此也比較擅長拍攝地方風土的自然景物，例如片中阿通和紅梅在海中共划一條船的海天一色，從高角度展現遠景的運鏡就顯得沉穩美麗。另外，片中以大遠景展現海上奎籠與漁船的夕陽即景，以及每一次阿通從岸上跳躍到舟楫划船的矯健身影，導演倒是捕抓到了地方景物和村民的情景交融。此片以西部片的寫實主義記錄了1950年代初新加坡榜鵝一帶甘榜的地理風土人情，這些在當年導演和攝影團隊眼中是異地新奇的景物和情調，但落在村民眼中不過是日常生活的景觀。

撇開地方風土人情不談，如果單從電影七拼八湊的情節設置、音軌和運鏡進行評述，此片顯得造作、空泛和無趣。總體來看，這不是一部合格的符合商業邏輯的好萊塢影片，叫人驚訝的是此片當年在新馬的票房竟然相當成功。影片廣告不斷以「美國攝影團隊在馬來亞」作為噱頭²⁴，再配合把此片形容為「強勁的動作片」的報章報導²⁵，讓此片沾上好萊塢的光環，很可能是吸引觀眾捧場的元素。此片在麗士戲院首輪正式放映連續三天，即1953年5月12至14日，每天連續在不同時段放映五場²⁶。1953年7月17日和1954年4月13日，《海峽時報》分別刊登廣告呼籲觀眾去邵氏經營的樂宮（Queens）戲院觀賞這部影片²⁷。這部當時在新加坡拍攝、長達兩個小時的劇情片在沒有註明是USIA產品的情況下，還是像其他好萊塢的反共電影般賣座²⁸。

1953年5月10日，《海峽時報》有記者以〈《小村烽火》背後藏着甚麼秘密？〉（“What Lies behind Mystery of ‘Kampong Sentosa’?”）為題，劈頭佯裝追問：「為何一間美國的商業電影公司會來新加坡拍攝一部有關馬來亞的馬來語片？恐怕在新加坡沒有人可以給予一個令人滿意的解釋。」接着，記者指出這實際上是一部交織着家居生活和特定甘榜村民情感的反共宣傳電影，並故弄玄虛地問道：

會不會這是聲馬達公司給予世界的一份無私的禮物？抑或是美國政府贊助有關公司拍的電影？甚至有可能是百萬富翁慈善家出資的電影？

然而無論是其代理商邵氏，或給予電影製作方便大門的新加坡公共關係部門，甚至協助攝影團隊的美國駐新加坡USIS也無法說清楚整件事情的來龍去脈。

該記者更走訪當時新加坡USIS署理所長博伊蘭（Robert J. Boylan），他回應道大家無需感到奇怪，並反問：「這是一家製作紀錄片和商業電影的美國公司，為甚麼他們不可以拍攝一部有關馬來亞的電影？正如《國家地理雜誌》喜歡製作一期有關馬來亞的特輯？」文末該記者提醒讀者，這是一部不需要懂得馬來語也能看得懂的電影，該片的攝影技巧非常出色，雖然故事節奏緩慢，但還是可以維持觀眾的觀影興趣，而且片中沒有任何誇大事實的劇情²⁹。顯然，這是一篇有助於該電影宣傳的報導，對美國政府資助有關反共電影的事實欲蓋彌彰，也許反而更引起讀者的好奇心買票進場看戲。

三 《星嘉坡故事》：「我們的新前途，就是新中國」

繼《小村烽火》公映幾個月後，聲馬達公司乘勝追擊，在1953年底放映粵語劇情片《星嘉坡故事》，劇本由「熟悉東方」之美國作家泰安（Glenn Tryon）所寫，「由本地粵語藝人主演」³⁰。1950年，新加坡USIS官員哈爾斯馬（James J. Halsema）於晚年訪談時透露，當年新加坡USIS最重要的涉及到新加坡的秘密活動就是建立起與本地未來領導人的聯繫，這包括跟當時還是左傾的李光耀

和日後成為新加坡總統的黃金輝等人建立關係。USIS對這些新加坡未來領導人的影響，不容低估^②。根據桑德斯 (Frances S. Saunders) 對美國中央情報局 (CIA) 的研究，冷戰期間美國國務院暗地裏在全球大量拉攏那些對共產主義感到幻滅、但依然信仰社會主義理念的知識份子，這些被當局稱為「非共左翼知識份子」(non-communist left) 是美援文化部署和支援的對象^③。因此當年 USIS 跟左傾、但不是共產黨員的李光耀建立聯繫，並不讓人感到意外。無獨有偶，李光耀晚年撰寫的第一本回憶錄，英文書名主標題即是《新加坡故事》(The Singapore Story)，雖然目前還沒有文獻顯示該回憶錄受到同名的粵語片《星嘉坡故事》啟發，但是李光耀在書中從英校生的角度估量華校生，基本上跟此片以美國人的視角看待華校生的方式有不少相似點。李光耀在其著述中站在英校生的立場，如此描述這些大部分尚處於中學階段、卻在共產黨影響下學會煽動群眾進行反帝反殖活動的華校生^④：

華人覺得受排斥，經濟上缺乏機會使華校成了共產黨人的滋生地……馬來亞共產黨反抗日本人的記錄使它有了威望。它開始在教室裏建立細胞組織。許多教師成了共產黨的幹部或同情者，日治時期學業中斷的超齡學生不少在思想上受到灌輸，成了馬共的成員……這是個生機勃勃的世界：有那麼多活躍份子，個個生龍活虎；有那麼多理想主義者，他們不自私，準備為更美好的社會犧牲自己的一切。看來他們完全獻身於革命事業，下定決心，一心只想推翻殖民地政府，建立一個平等和公平的新世界，這給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對他們的領袖給他們指引的方向，我越來越感到害怕。但是我深信，如果我駕馭不了其中一些幹勁十足的年輕人，使他們為我們的事業服務，為我和我的朋友們，這些英校生所代表的事業服務，我們就永遠不會成功。

李光耀貫穿全書的論點就是華校生反帝反殖的運動都是幕後受到共產黨的指使。而《星嘉坡故事》正是聚焦於 1950 年代新加坡華校的中學生如何被共產黨影響和利用，最後導致家破人亡的悲劇。

此片開頭以粵語的畫外音如此描述英殖民政府治理下的新加坡繁榮景象：

亞洲最南的部分是馬來亞，馬來亞最南的部分是星嘉坡，這些是星嘉坡的房屋，這些房屋有些是隨便起的，有些是按照計劃起的。在計劃之中，有城市計劃、工業區計劃或私人計劃。這個是碼頭的貨倉，用來轉運東方貨物到世界各地去，表示它是世界上一個自由通商的港口，星嘉坡跟全世界各大城市都有密切聯繫，互相往來，每個對星嘉坡繁榮有所幫助的人，他們的內心也感到非常光榮。今日，1951年9月22日是星嘉坡升格的日子，從今天起，這個從森林變成山芭，由山芭變成鄉村，由鄉村變成城市的星嘉坡已經在法律上被宣布為一座城市了……

影片開頭點出了新加坡在世界地圖的具體位置和其作為自由通商港口的重要性。當旁白說道「每個對星嘉坡繁榮有所幫助的人，他們的內心也感到非常光

榮」後，攝影鏡頭對準風中飄揚的英國國旗，做了一個長達幾秒鐘的大特寫，以暗示新加坡的繁榮跟英殖民政府的有效治理有關。接着影片交代了具體的時代背景，1951年，新加坡升格為市的慶典，全市隆重慶祝。片中再現英軍浩浩蕩蕩的閱兵儀式和童子軍隊伍的步操，以及舞龍舞獅、花車遊行與煙花表演，一片歌舞昇平。

片中的男主角是新加坡的華裔布商王崇德，1951年9月22日當天也是他的六十大壽，他走進一家茶餐廳，在其妻之叔張美華和幾個朋友恭賀他生日的歡喜氣氛下幽默地說了一番話：「你看今天這麼多人來參加這個大日子，又有總督演講，今晚又有舞龍遊行，這些都是為了我今天的生日，但不值得這麼隆重啊……」接着，這位被朋友打趣形容為「整個樣子都是地主相」的布商自稱「所有的生意和鋪頭是我一生的好名義……我有這麼多財產，將來我夠不夠讓我的子孫享受？」這句話為他接下來在生日晚餐指明要三個兒子繼承財產和擴充家族營業的希望做了鋪墊。

隨後，整部片子就是交代王的上述希望如何落空的過程。他的三個兒子分別是大兒子阿郭、二兒子阿祥和三兒子阿周，都是華校的中學生，經常在放學後被一位駕着跑車、打着領帶，衣着光鮮的中年華裔男性到處載他們去兜風。這位男性即是在《小村烽火》中飾演「老毛」角色的男演員，在《星嘉坡故事》中他也是共產黨的化身，名為蔡良，是一名共產黨特務。他經常在兜風過程中向王的三個兒子灌輸反帝反殖的思想，也把一本陸君平編的《新中國》贈予他們閱讀，並把他們引導進入學習班聆聽他的教導：

……你們已經是成人，為甚麼人們還把你們當作小孩子來看待？這些文章是很有趣的，你們拿去研究之後，你們的知識和興趣就會增加，你們要謹慎，千萬別跟第三者討論我們的工作。因為我們的工作很需要保密。如果我們的秘密能夠保守久一點，我們就會成功，反對我們的人，不用很久就會知道我們的實力，我們在擾亂他們的時候出現，我們自然會變成人民的領袖。馬克思還有列寧主義就會證明這個事實，同時這個主義已經解放新中國。

這些激勵學生嚮往新中國馬列主義的話，尤其對阿郭和阿周產生影響，阿祥對此則比較有保留。阿郭即將中學畢業，課後一直幫忙王在布店裏做賬，阿祥和阿周則協助送貨。後來王發現阿郭做賬出現紕漏，也注意到他閱讀《新中國》，就對這大兒子起了疑心和戒心，決定把做賬的任務交給阿祥，命令阿郭今後負責送貨的工作。阿郭卻堅持要做賬，跟父親起衝突，但還是不得要領，就私下叫阿祥做賬動手腳，從中把沒報上去的錢捐給共產黨學習班。阿祥不願欺騙父親，也對學習班的知識產生懷疑。

為了凸顯共產黨陣營和非共產黨陣營如何競相向年輕人灌輸兩種不同的意識形態，片中出现一組平行蒙太奇鏡頭，一邊廂穿插蔡良在學習班呼籲年輕人拋棄迷信的宗教，灌輸新中國馬列主義的鏡頭：「新中國是人民的中國，這世界是人民的世界！」另一邊廂則是張美華在茶餐廳跟年輕人循循善誘，教

導維護傳統家庭倫理「忠實、信仰和敬愛」以及發展科學知識的重要性，並以不點名的方式批評共產黨：「為了他們的理想，會沆瀣一氣來破壞社會，他們或者暫時擁有勢力，可以迷惑整個國家的人民，但是他們的結果會被頭腦清醒的良民打倒的！」王也訓誡兒子不要被「新政治的理想主義迷惑」，僅有阿祥受其勸告。

蔡良大力慫恿王的三個兒子投奔中國，並恐嚇道：「不回中國的男人，只好去為新加坡政府當兵。」這段話微妙地為英殖民政府即將頒布的《國民服務法》(National Service Ordinance) 埋下伏筆。這項在 1954 年 3 月 17 日在媒體公布的法令是為了應付馬共領導的抗英武裝鬥爭，英方規定「凡年齡在十八至二十歲的各類男青年，都得登記準備參加軍事訓練，否則將被處罰」^{②4}。此措施後來引發新加坡的華校中學生的強烈反對和集體和平請願，並成立「免役代表團」跟英方談判。當時華校中學生當中有不少是超齡生，正是徵兵的對象，英方要求他們服兵役，等於是要求他們停學。本來是集體和平請願的訴求，在 5 月 13 日英方的鎮壓下發生流血事件，也就是後來史家所稱的新加坡「五一三」事件^{②5}。李光耀當時受邀擔任華校中學生「免役代表團」的法律顧問，他代表被捕學生，指出警方的無理和武斷，還教導學生如何應付警方的盤問。李光耀當學生代言人，在立法議會和其他政治論壇，就學生關心的問題，特別是華文教育問題，替學生說話，轉達學生的意見，替學生爭取權益^{②6}。

阿郭和阿周聽信蔡良對新中國的美好想像後，決定離開新加坡投奔中國。阿郭跟女友秀蘭成婚後的隔天清晨，在蔡良的安排下跟阿周偷偷乘船到中國。本來隨行的阿祥在最後一分鐘決定取消行程，卻被蔡良暗中殺害了。王和其妻一夜之間痛失三個兒子，悲痛萬分。蔡良多次向王勒索，謊稱打聽到他三個兒子在中國的下落，但需要王付一大筆錢疏通中國官員，讓兒子回到新加坡；王屢次上當，幾乎傾家蕩產，就是希望三個兒子早日歸來。

阿郭和阿周抵達中國後，懷抱着「我們的新前途，就是新中國」的理想很快遭受挫折，他們沒料到的是被蔡良安排在中國從軍。官員對他倆的呼呼喝喝以及當兵的艱苦訓練，令阿郭產生要離開兵營的念頭。阿郭得知從軍同伴何彬即將被調離部隊去黨的辦公室擔任文書，遂在營中留下何彬的遺物，向當局暗示何彬已自殺，但實際上是他把何彬殺了，並穿上印有其編號和名字的軍服，去黨的辦公室謀取到文書的職位。「何彬」玩弄辦公室權術，誣陷同志，步步高升，最後升為主任級的幹部。

王不再輕信蔡良的謊言，決定親身到中國拜訪鄉親好友，尋找兒子的下落。他在跟鄉親好友訴苦當兒，批評共產黨，卻被其中一人向共產黨當局舉報，遭受當局逮捕。審訊當天，負責審訊此案的是何彬，王認出這是他的大兒子阿郭，但何彬卻不動聲色，佯裝不認識眼前的父親。在聆聽主控人的證詞後，何彬宣判王死刑，王在警衛的挾持下大聲痛罵大兒子的無情和不孝，跟着就被槍斃了。不久，何彬在辦公室也被另外一位同志誣讒，最後也被共產黨判處死刑。至於阿周在片末也遭遇不測，在激烈的抗美援朝戰場上，他為了拯救軍中同志，最後被手榴彈炸死。另一方面，張美華在新加坡報警抓拿蔡良，在警車追逐蔡良的過程中，蔡良發生車禍喪生。王的家庭最後僅剩

下兩個女人，即傷心的王妻和王的媳婦。王的媳婦在丈夫阿郭投奔中國後誕下一個男嬰，為王家傳承香火。

《星嘉坡故事》於1953年12月13日在新加坡的東方戲院及大光戲院首映，《星洲日報》「電影消息」欄目指稱「其內容寫述一華僑布商之悲慘遭遇，劇情曲折迂迴，極為動人」³⁷。12月15日，《南洋商報》廣告宣稱片中反映的「是利害人是思想交戰」，並突出此片「全部在新加坡攝製」，「美國聲馬達影片公司新出品」³⁸。邵氏承印的戲橋本事（電影簡介宣傳單張）甚至以「中共曾派秘密代表駐於星加坡」來誇大此片的真實性，也以廣告宣傳此片：「寫出新嘉坡華僑的生活的一部動人粵語新作，描寫父母之愛無微不至。敘述時代悲劇十分動人，莘莘學子誤入歧途，美好家庭籠罩重霧。」³⁹從1953年12月至1954年1月，此片也陸續在全馬各地如怡保、金寶、馬六甲和檳城的戲院上映，甚至在1959和1961年也還以片名《新加坡故事》分別在吉隆坡和怡保的戲院公映⁴⁰。

此片的敘事模式嚴格按照美國國務院〈宣傳戰略〉的兩個重點：其一，全面啟動「反共」宣傳，揭露中共在大陸實施殘酷的社會監控、鎮壓以及動輒進行死刑的暴行。此片着力渲染中共的黑暗面：父親批評共產黨隨即面臨社會監控機制的舉報，下場就是死刑；大兒子也是通過舉報他人升官，被舉報的同志一個又一個被判死刑，最終大兒子也被其他同志舉報，同樣面臨死刑的命運；其二，揭示中共政權無力也無意支援和保護海外華僑，東南亞華僑的個人利益跟共產黨勢力在東南亞的擴張是勢不兩立的。此片即是通過新加坡華僑布商一家幾口如何被共產黨勢力殺害，教育新馬觀眾提防共產黨勢力對華人家庭的謀財害命，把華僑的利益跟共產黨勢力進行二元對立，點出華商以家族為中心的財富累積終究跟共產主義是存在根本矛盾的。

《星嘉坡故事》對1950年代初期當地華校中學生的再現是非常呆板和無趣的，他們就像被共產黨幕後操控的木偶，背着台詞，木納和被動地任由共產特務指使，絲毫沒有集體組織和行動的能力。比較起來，李光耀在同一段歷史時期接觸和觀察到的華校中學生卻很不一樣：「學生們組織良好，紀律嚴明，團結一致。他們自我約束的能力強得不得了，能採取集體行動，集體表示蔑視，使政府難以孤立他們的領袖，把他們抓來懲罰。」⁴¹縱然如此，無論是電影《星嘉坡故事》或李光耀的回憶錄《新加坡故事》均是殊途同歸，都旨在揭露這些華校中學生被共產黨勢力洗腦。此片大肆渲染這些新加坡中學生在共產黨特務的蒙騙下「回國服務」的悲慘下場，卻同時遮蔽了歷史現場上那些主動懷抱馬列主義自願回國的華校生，以及大量被英殖民政府逮捕後驅逐出境，然後被強制遣返中國的華校生。

《星嘉坡故事》是否一部有效的政治宣傳影片？相對於《小村烽火》七拼八湊的情節發展，此片的情節結構比較完整，對抗美援朝戰爭大場面的場景調度頗費匠心，雙方駁火的戰場從山上到河流，出動的坦克和軍隊烘托了戰爭現場的真實性，比起《小村烽火》的森林槍戰更引人入勝。可是此片對白跟《小村烽火》一樣大部分顯得生硬，由於導演和編劇無法掌握本地人的語感，演員大概也被訓令一字不漏地背誦那些從英文劇本翻譯成粵語的台詞，導致這些粵語對白聽起來相當拗口。除了男主角和其妻子的演技比較自然外，其他角

色在鏡頭前顯得生硬，這些業餘的華裔演員有幾位也在《小村烽火》演出，表現同樣未如理想。

上述問題不僅出現在這兩部片子裏，也體現在其他國家由美國國務院資助拍攝的反共電影裏。1953年，一位美國銀行家在《紐約時報》(*The New York Times*)就公開呼籲美國政府徹底停止資助這些在國外攝製的政治宣傳電影，因為美國政府是在動用美國納稅人繳付的數百萬所得稅來資助這些反共電影；況且，在他看來，這些徹底地由業餘演員、「幫倒忙的人」(do-gooders)和美國人攝製的政治宣傳電影並沒有達到預期的效果，反而由美國專業電影公司攝製的商業劇情片卻成功把美國價值觀和生活方式宣傳到世界各地，原因就在於它們不是政治宣傳電影，能提供娛樂給全世界的人們，因此在美國國內和國外的票房都能取得成功⁴²。

四 餘論

《小村烽火》和《星嘉坡故事》都出現了戰爭場面：《小村烽火》再現英軍擊斃馬共游擊隊員的血腥場面；《星嘉坡故事》則再現美軍出動坦克炮轟和擊退中國軍隊的戰爭畫面。兩部片子都像其他好萊塢導演如福特(John Ford)導演的那些反共電影那樣，透露出以美國為首的強大軍隊在維護着世界和平及秩序⁴³。兩部片子的幕後電影工作人員名單清一色都是外國人，但幕前演出的名單卻均是新馬本地人；沒有任何主要的美國人角色在片中再現，當然也不可能像那些由好萊塢攝製的商業英語劇情片那樣直接宣揚美國價值觀和生活方式。但這些用新馬本土語言攝製的反共電影畢竟跟好萊塢的英語片所要面對的觀眾群是不一樣的，前者主要面向新馬和印尼那些僅熟諳本地語言，或對英語片有所抗拒的大眾群體；後者主要面向的是新馬和印尼那些熟諳英語，或平時喜歡觀賞英語片的知識群體。當年美國在東南亞策劃「真理運動」的心理戰計劃和項目，當局鎖定的對象就是本土的大眾群體⁴⁴。這些大眾群體多數不熟諳英語，因此影片需要以本土的語言呈現才能把「真理運動」的反共信息有效傳達給他們。

聲馬達公司在1950年代初期不只是在新馬攝製這兩部片子，這支團隊也在馬來亞攝製了另外三部反共影片，其中兩部是粵語片，分別是《到哥達丁宜之路》(*The Road to Kota Tinggi*, 1952)和《紙老虎》(*Paper Tiger*, 1953)，另外一部是黑白片《死亡的命令》(*The Command That Dooms*, 1952)。以《到哥達丁宜之路》為例，它是一部僅長四十分鐘的彩色粵語片，從目前筆者收集到的電影本事看來，此片講述一位跟馬共素有合作的男子，被本地警察通緝。為了躲開捕抓，他逃入哥達丁宜的粵劇團尋求庇護，當時粵劇團在台上演出一部反共話劇，有一群暴虐的馬共游擊隊員在欺壓老百姓，老百姓從退縮到後來的反抗，最後贏得勝利。這個男子看了話劇之後，最後決定投降，並選擇與警方合作，讓警方可以捕抓到一些馬共游擊隊員⁴⁵。此片的本事出現在當年新加坡USIS圖書館的電影目錄中，可以推測當時這部影片可供公眾在該圖書館觀賞。《到哥達丁宜之路》也曾通過雪蘭莪新聞部的流動電影設施在西馬各

地放映，《南洋商報》報導此片在丹絨馬林公映：「尤以話劇表演逼真，惟妙惟肖，頗獲觀眾好評。是晚被吸引之觀眾，達千人以上，盛況空前云。」⁴⁶從這段報導可見，聲馬達公司在新馬攝製的冷戰電影雖然品質參差不齊，在電影藝術上未必能夠討好知識群體，但這些反共電影在英美雙方政府聯合推動下持續流通於新馬民間，並通過流動電影的設施免費重複放映給全馬各鄉區小鎮的大眾群體。這些多半是文盲的大眾群體本來就對電影的藝術品質要求不高，直接傳達反共信息的電影反而更容易被他們吸收，長遠來看似乎可以達到「真理運動」心理戰期望的效果。

聲馬達公司於1952年8月離開新馬後就沒有再回到那裏攝製反共電影，那時候正值美國民主黨杜魯門執政的晚期，隔年共和黨的艾森豪威爾接任。艾森豪威爾並沒有放棄杜魯門「真理運動」的資助拍攝反共電影政策，但更着重這些反共電影在各地區有沒有達到最終的反共效果。根據一份由美國政府在1952年11月出爐的調查報告（這個調查覆蓋四十四個國家，主要調查美國政治宣傳在這些國家的影響力），發現當時的美國政治宣傳在印尼沒有發揮到應有的作用，比起東南亞各國，印尼人最不受美國政治宣傳影響，當地人民持續有一股反美情緒，對西方保持懷疑，或者採取中立的態度⁴⁷。由於聲馬達公司在新馬攝製的反共電影《小村烽火》和《星嘉坡故事》均在1953年公映，這份1952年的調查報告肯定沒有涵蓋這兩部電影的影響力。無論如何，1953年《紐約時報》持續有報導認為這些在國外攝製的反共電影並沒有達到政治宣傳的應有效果，因此呼籲國會要大大削減杜魯門政府當年對這些項目投下的龐大開支⁴⁸。

艾森豪威爾上台後，並沒有放棄要求好萊塢導演攝製反共電影的政策，反而在1953年4月通過USIA成功邀請到好萊塢製片人戴米爾（Cecil B. DeMille）出任國際新聞署（International Information Administration, IIA）的影片顧問主席，希望他能爭取到整個美國電影工業給予國務院積極的配合。兩個星期後，《紐約時報》就報導國務院已從美國銀幕導演工會（The Screen Directors Guild of America，下稱導演工會）提供的會員名單中選了二十八個好萊塢導演，要求他們每人簽下合約並騰出四個星期以內的時間攝製三到四部的反共電影系列，以繼續配合「真理運動」對共產主義的杯葛⁴⁹。這個好萊塢導演名單後來在媒體提前曝光後，卻引來IIA所長出面否認，澄清當局現階段「僅是提出需求而已」⁵⁰。這引起導演工會主席的不滿，並公開之前國務院致當局的信函內容，認為國務院現在否認這個導演名單的存在，是對愛國主義的一種諷刺，因為導演工會的會員是多麼渴望滿足國務院最初的要求⁵¹。IIA所長後來回應指有關二十八個導演已被確定的報導是不真實的，不過他呼籲全美電影工業繼續給予IIA愛國道義上的支持⁵²。

從這則事件看來，至少讓我們看到好萊塢電影工業的主流敘述當年是多麼願意配合美國國務院攝製這些反共電影。不過，導演伊遜的名字並沒有出現在上述導演名單裏，因為他在新馬拍攝了幾部冷戰電影返回美國後心臟病發作，於1956年去世。他晚年所拍的這些冷戰電影不但貫徹了杜魯門時代「真理運動」的反共意識形態，也再現了新馬的不同族群曾經如何以自己的方言土語響應「真理運動」的號召，這進一步為我們重新反思冷戰意識形態如何再造新馬族群的身份認同和本土意識提供了歷史現場的印證材料。

註釋

- ① Harry S. Truman, "Text of President's Plea to Editors to Help Crush Red 'Lies'", *The New York Times*, 21 April 1950, 4.
- ② Secretary of State, "A Report to the National Security Council by the Secretary of State on U.S. Policy toward Southeast Asia", NSC 51, 1 July 1949, Gale Digital Collections, U.S. Declassified Documents Online, tinyurl.galegroup.com/tinyurl/53pRz8, 4-5, 5, 16.
- ③ Laura A. Belmonte, *Selling the American Way: U.S. Propaganda and the Cold War* (Philadelphia, PA: 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08), 47-49.
- ④⑦⑩⑲ Nicholas J. Cull, *The Cold War and the 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Agency: American Propaganda and Public Diplomacy, 1945-1989*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67-75; 58; 109; 109.
- ⑤ Andrew Defty, *Britain, America and Anti-Communist Propaganda 1945-53: The Information Research Department* (New York: Routledge, 2004), 140.
- ⑥ John W. Henderson, *The 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Agency* (New York: Praeger, 1969), 42.
- ⑧④ "Gains in U.S. Truths against 'Lie' Seen", *The New York Times*, 24 February 1951, 11.
- ⑨ Thomas M. Pryor, "Films Aid 'Truth Campaign': State Department's Own Movie Division Expands Production Activities in Mounting War of Ideas with Russia", *The New York Times*, 25 March 1951, 81.
- ⑩⑫ 谷川建司：〈美國政府與好萊塢電影產業的相互依存關係〉，載貴志俊彥、土屋由香、林鴻亦編，李啟彰等譯：《美國在亞洲的文化冷戰》（台北：稻鄉出版社，2012），頁50-51；54-56。
- ⑬ Assistant Secretary of State for Public Affairs, "USIS Plan for Overseas Chinese in Southeast Asia", 28 May 1952, Record Number: RG59, Accession Number: Lots 53D126 & 53D196, Box 100, Records Relating to International Information Activities, 1938-1953, National Archives and Records Administration, US.
- ⑭ 翟韜：〈美國對東南亞華人宣傳政策的演變（1949-1964）〉，《美國研究》，2013年第1期，頁122。
- ⑮ Elmer Newton, "Letter from Elmer Newton, American Consul, Director of 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Service (Singapore) to Colonial Secretary", 5 August 1952, Record Number: 00211/51, Accession Number: FCO 141/14533, 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Services (USIS) Activities in Singapore and the Federation of Malaya, Proposal for a Field Study in Malaya by the Bureau of Applied Social Research of Columbia University, National Archives of Singapore.
- ⑯ 該導演另有名稱B. Reaves Eason，然而當年《小村烽火》和《星嘉坡故事》的片幕都寫作B. Reeves Eason，因此本文採用此名。
- ⑰ Jack L. Warner, "Pro-American Short Subjects", in *Hearings Regarding the Communist Infiltration of the Motion Picture Industry: Hearings before the Committee on Un-American Activities, House of Representatives, Eightieth Congress, First Session, Public Law 601 (Section 121, Subsection Q (2))*, ed. Thomas J. Parnell (Washington, DC: United States Government Printing Office, 1947), 24-31.
- ⑱ Jennifer Horne, "Experiments in Propaganda: Reintroducing James Blue's Colombian Trilogy", in *The Documentary Film Reader: History, Theory, Criticism*, ed. Jonathan Kahana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16), 409.
- ⑲ W. Henry Lawrence Jr., "American Information in Malaya", *The Straits Times*, 4 February 1950, 9.

- ⑳㉑ James J. Halsema and G. Lewis Schmidt, "Interview with James J. Halsema", The Association for Diplomatic Studies and Training, Foreign Affairs Oral History Project, Information Series, Library of Congress, 19 August 1989, <https://cdn.loc.gov/service/mss/mfdip/2004/2004hal03/2004hal03.pdf>, 29; 24-30.
- ㉑ 〈廣告：小村烽火〉，《南洋商報》，1953年5月9日，第7版。
- ㉒㉓ 參見Nan Hall, "What Lies behind Mystery of 'Kampong Sentosa'?", *The Straits Times*, 10 May 1953, 11。
- ㉔ 英國殖民政府一向有意建構有關馬共的刻板印象，馬共份子清一色都是華人，馬來人是馬共威脅的受害者。例如在其屬下的馬來亞製片組製作的反共電影，馬共成員近乎清一色都是面目可憎或面目模糊的黃種人。參見許維賢：〈打造馬來亞：論馬來亞製片組的冷戰影像〉，《藝術學研究》，2016年第19期，頁61-104。
- ㉕ "Advertisement: Kampong Sentosa", *The Straits Times*, 12 May 1953, 4.
- ㉖ "Emergency on the Screen", *The Straits Times*, 8 May 1953, 9.
- ㉗ "Advertisement: Kampong Sentosa", *The Straits Times*, 9 May 1953, 8.
- ㉘ "Advertisement: Kampong Sentosa", *The Straits Times*, 17 July 1953, 2; "Advertisement: Kampong Sentosa", *The Straits Times*, 13 April 1954, 4.
- ㉙㉚ 〈電影消息：新嘉坡故事〉，《星洲日報》，1953年12月12日，第6版。
- ㉛ Frances S. Saunders, *The Cultural Cold War: The CIA and the World of Arts and Letters* (New York: New Press, 1999), 62-63.
- ㉜㉝ 李光耀：《李光耀回憶錄(1923-1965)》(新加坡：聯合早報，1998)，頁197-202；198。
- ㉞㉟㊱ 陳國相：〈簡述二戰後新加坡的華校學生運動〉，載莊樂田編：《英殖民地時代新加坡學生運動珍貴史料選(1945年9月-1956年10月)》(新加坡：草根書室，2012)，頁27；18-41；37-38。
- ㊲ 〈廣告：星嘉坡故事〉，《南洋商報》，1953年12月15日，第7版。
- ㊳ 參見〈戲橋：新嘉坡故事〉(新加坡：邵氏兄弟有限公司，1953)。
- ㊴ 〈廣告：新加坡故事〉，《南洋商報》，1959年1月18日，第12版；〈廣告：新加坡故事〉，《南洋商報》，1961年10月22日，第12版。
- ㊵ "Castle Scores Films Made by U.S. Abroad", *The New York Times*, 5 May 1953, 35.
- ㊶ 例如福特在《光榮代價》(*What Price Glory*, 1952)中描述陸軍，《西點軍魂》(*The Long Gray Line*, 1955)描述西點軍校，以及描述韓戰的紀錄片《這是韓國》(*This is Korea*, 1951)。參見谷川建司：〈美國政府與好萊塢電影產業的相互依存關係〉，頁54-56。
- ㊷ *Catalog of 16mm Motion Picture Films* (Singapore: United States Information Service, 1954), 101.
- ㊸ 〈雪新聞部流動電影，蒞吉葬埠放映〉，《南洋商報》，1954年1月16日，第10版。
- ㊹ Russell Porter, "Propaganda Drive of U.S. Said to Vary in Effect Overseas", *The New York Times*, 24 November 1952, 8.
- ㊺ "Citizen Investigator Asks Slash in 'Voice'", *The New York Times*, 26 May 1953, 8.
- ㊻ 參見Thomas M. Pryor, "U.S. Enlists Help of Film Directors", *The New York Times*, 13 May 1953, 34。IIA跟USIA密切相關，同屬美國國務院的機構。
- ㊼㊽ "Chief of Information Answers Film Men", *The New York Times*, 16 May 1953, 9.
- ㊾ "Film Men Rebuke State Department", *The New York Times*, 15 May 1953, 19.